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的影响

——基于全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韩文静¹, 张正峰²

(1. 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5;
2. 中国人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本文基于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逻辑设定, 运用全国大样本农户微观调查数据, 采用 Logit/OLS 回归和 PSM 方法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生计非农化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 农地流转可以为农户提供生计多样化选择的机会, 农地转出可以促进农户从事多样化的生计策略, 提升农户生计非农化水平; 转入农地为农户实现农业生产规模经营创造条件, 可以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向生计策略; 农户生计异质性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的关键因素。基于上述结果, 本文认为发展功能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仍是现阶段农地流转政策的主要方向; 提升人力、物质、金融资本能够提高农民生计多样化水平。

关键词: 农地流转; 生计策略; 生计多样化; CFPS; PSM

中图分类号: F30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210-(2024)02-75-15

The Impact of Farmland Transfer on Diversifi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Farme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

HAN Wenjing¹, ZHANG Zhengfeng²

(1. School of Gover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FID's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framework,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land transfer on household livelihood strategy selection and the degree of non-farm livelihood using national large-sample household micro-survey data, employing Logit/OLS regression and PSM method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farmland transfer will provide farmers with opportunities to diversify their livelihoods. Farmland transferred-out participation will promote farmers to engage in diversified livelihood strategies by enhancing the level of non-agricultural livelihoods. Farmland

收稿日期: 2023-11-09; 改回日期: 2023-12-24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74 批面上项目(2023M740289); 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GZC20230258); 中央高校基本业务专项基金(123310003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项目(23FYZ060)

作者简介: 韩文静(1993—), 女, 博士, 讲师, 从事土地经济与政策研究。E-mail: hanwenjing@bnu.edu.cn

transferred-in participation can promote farmers to engage in agricultural livelihood strategies,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farmers to achieve scale production. The heterogeneity of farmers' livelihoods i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diversification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 well-functioning farmland transfer market remains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e current rural land policy. Meanwhile, upgrading human, physic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can increase diversification of farmers' livelihoods.

Key words: farmland transfer; livelihood strategy;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CFPS; PSM method

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是充分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缓解农村内部发展不均衡的关键突破口^[1-3]。城乡要素市场二元分割的背景下,农地(即农用地)是农村诸类土地要素(包括农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中最先被全面盘活的生产资源,农地流转因而成为实现农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必要途径。农地流转市场的灵活性、低成本特征为农地发挥要素资源的最大生产力创造了条件,对提高我国农村农业生产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4]。

自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农业生产关系的不断变化,沿着“产权合一”到“产权分离”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脉络^[5],我国农地市场发育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禁止流转”,到 1984 年国家政策开始允许农地在集体内部“有限流转”,到 2003 年《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正式确认农地流转合法化地位,再到 2016 年“三权分置”改革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法律地位和权能的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持续改革使农地流转市场不断发育完善。

自 2005 年以来,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农地流转规模持续上升,2018 年后流转规模持续保持高位(图 1),并呈现出流转形式不断丰富、流转主体不断多元化、农地流转交易平台增加等特点。从规模上看,到 2021 年底,全国农地流转面积超过 $3\,713.33 \times 10^4 \text{ hm}^2$,约占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 34%;从流转形式上看,除了传统的出租、转包、互换等形式外,全国各地探索出“股份合作”“地票”“土地信托”“两分两换”“土地换社保”等多样化集体流转形式;流转主体方面,《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显示,农地流转至合作社、企业等农业现代化主体的耕地面积不断增加;从交易平台数量上看,截至 2021 年,全国已有 1 474 个县(市、区)建立流转市场,2.2 万个乡镇建立流转服务中心。总体显示出我国农地要素流转活跃、农业现代化之路加速发展的格局。

土地禀赋是中国农户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在农地“三权分置”产权体系下,农地流转市场的全面盘活为农户自由选择是否参与市场交易创造了条件,让农户能最大程度自主支配承包地的使用,为改善其生计策略提供了选择机会。目前,国内外学者已围绕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对其生计策略的影响开展了丰富研究,但已有研究多为对特定区域的案例研究,由于各研究区域地理条件、农业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关于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是否会带来积极影响,以不同区域、不同尺度所得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缺乏全国农户微观尺度的经验证据。此外,已有研究对农地流转参与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机理性阐释不足。基于此,本文拟基于 DFID 可持续生计框架的逻辑设定,利用全国农户调查数据,采用 Logit/OLS 回归和 PSM 方法实证检验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生计非农化程度的影响,以期为指导农地流转市场推进工作提供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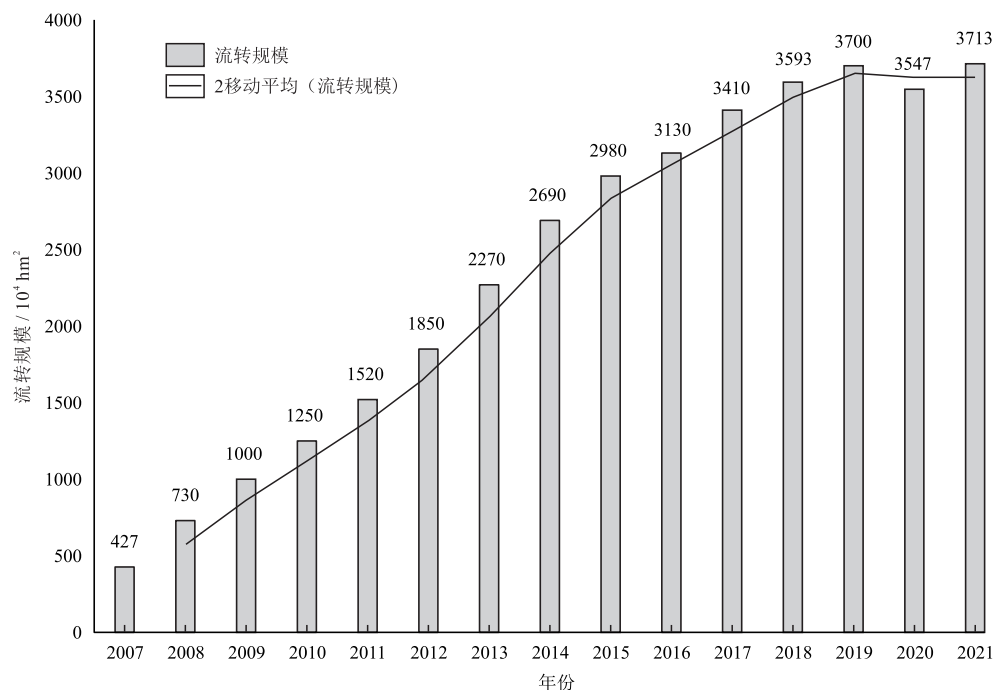


图1 2007—2021年中国农地流转规模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年报》公布的数据整理绘制。)

一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综述

自 Ellis^[6] 于 1998 年发表《家庭策略与农村生计多样化》(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rur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一文以来,对于发展中国家农民生计多样化的研究逐渐增多,近二十余年来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研究话题。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市场与其生计密切相关。受限制的土地租赁市场会阻碍农户生计多样化过程。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已经接近普遍接受(near-universal land access)所有农户的准入^[4]。农地流转市场参与可以改变家庭农地资源数量和空间格局,影响转入户与转出户生产资源配置和生产关系,进而调整生计策略选择。

国内外学者已围绕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生活的影 响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从微观角度来说,农地流转主要通过对家庭劳动力格局、生产效率的影响而为农户生计策略改变提供机会。具体而言,农地流转被学者们认为可以改变农户内部劳动力生产格局,比如转出农地会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意愿^[7],促进农民外出务工就业^[8],促进农民创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升级^[9]。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农地流转不会显著影响劳动力迁移,只有在确保非农就业稳定的情况下农民才会转出农地,转出农地对非农劳动就业的影响还会受到地区机械化程度的限制^[10-11]。此外,农地流转被认为会改变家庭农业生产效率,尤其转入农地会增加农户对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12]和土地生产率^[13]。然而,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由于传统农业经济中的要素市场不完善,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程度不足,农业规模化经济无法实现^[14],农业生产规模与生产率间往往呈现负向关系^[15-16],转入农地并不会影响家庭农场生产力^[17]。综上可知,

由于学者们研究区域和研究尺度选择的差异性,关于农地流转对农户生产生活是否会带来积极影响尚未得到一致结论。

也有学者具体开展了关于农地流转对转入和转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研究。转出农地被很多学者认为可以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选择。与传统单一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户相比,农地转出户一般从事兼业化生计活动^[18-20]。对转入方而言,虽然转入农地则会抑制家庭从事非农化、多元化生计策略^[21],但能为他们扩大生产规模、实现专业化生产经营提供机会^[22],农地流转是职业农户提高生产能力和经济收益的必要方式。然而,已有研究关于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的机理性阐释不足,且多为局限于某一地区的案例研究为主,缺乏全国性实证经验。

由英国国际发展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所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分析外部环境变化与制度变迁对农户生计影响的有效分析工具。国内外学者已从环境变化^[23]、扶贫政策^[24]、土地制度改革^[25]、征地^[26]等角度分析了其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农地是农户最基础的生产资料,农地流转活动对其生计策略选择起着关键作用。本文拟应用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将其作为构建本文实证分析农户农地流转参与对其生计策略多样化分析的逻辑基础。

(二)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图 2 所示的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27]揭示了人们追求生计产出过程中各基本要素的构成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其基本设定是:人们利用各种资产从事生计策略活动,追求一系列生计产出(如健康、收入、脆弱性降低等);在实现生计产出的过程中,人们所采取的生计策略活动不仅会受到脆弱性环境的影响和冲击,还取决于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如制度、政策和文化因素)和组织结构(如政府或社会部门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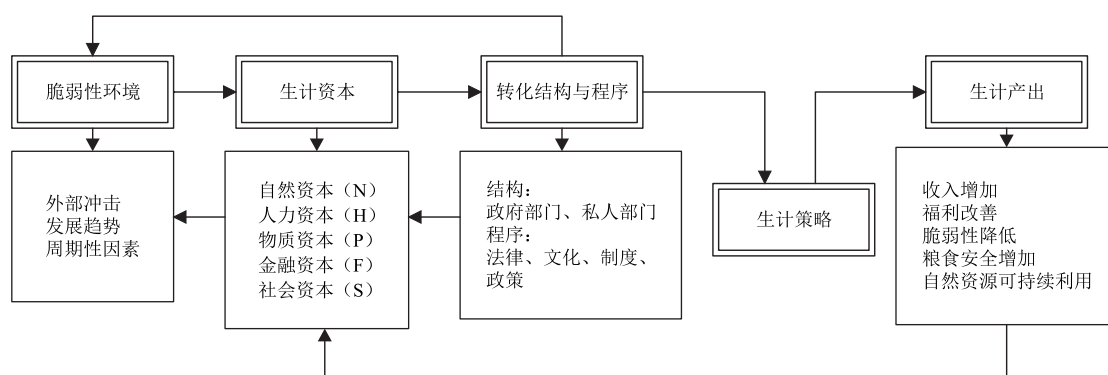


图 2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在此框架中,“脆弱性环境”是指对人们生存外部环境的描述,特别是指无法通过人为活动调控的因素。“生计资本”是指人们实现所有生计活动的资源基础^[28],在农户生计策略实现中发挥着主导作用。DFID 框架中确定了五类资本,即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其各自在影响农户生计活动和生计产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生计策略”表示人们为实现生计目标而进行的活动。一个家庭的生计策略取决于其获得不同类型资本的机会,以及各种生计资本的使用组合。

此外,“转化结构及程序”包括促进人们生计活动实现的机构、组织、政策和立法机制等。组织结构与制度环境变动会直接影响人们生计战略的选择和生计产出。农地流转是我国农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影响下促进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多样化的关键路径,在农户生计策略转型中发挥着催化的作用。以1978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改革为开端,我国农地市场发育经历了从“禁止流转”到“三权分置”体系下农地流转合法化的过程。因此,农地流转是由“转化结构和程序”所决定的影响农民生计活动变化的外部制度环境变量。对普通农户而言,由于农业生产和非农就业间的报酬差距,当家里的剩余劳动力能得到非农就业机会时,流转市场的准入使农户可以选择将农地经营权出租给他人的同时,保持对农地的承包权以保留作为农民的社会文化身份,通过劳动力迁移、参与非农就业等方式完成农户生计策略转型。

基于此,本文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逻辑设定,将农地流转参与作为影响农户基于其生计资本开展生计策略活动过程的外部机会变量,以全国范围大样本农户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农地流转参与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及生计策略多样化的影响,以评估全国农户微观尺度下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对农户生计转型所起的积极作用,为开展全国层面的农地流转宏观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二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数据库。该数据库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完成,每两年组织调查一次,调查内容涵盖了中国家庭经济活动、家庭关系、人口迁移、健康等方面的综合信息。CFPS样本采用了基于内隐分层抽取(Implicit Stratification)的多阶段等概率抽样方法,覆盖了25个省(区、市)(除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和港澳台地区),具有一定的全国代表性。已有研究显示,2014年“三权分置”改革的出台对于全国层面的农地流转市场有显著政策冲击,提升了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29]。为避免政策冲击的影响,提高实证模型估计的准确性,参考其他农户生计研究采用多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做法^[30-31],本文采用“三权分置”改革后的2016年、2018年两期数据(下分别简称CFPS2016数据、CFPS2018数据)作为基础研究数据。

(二)变量选择

1. 农户生计策略类型的划分

随着城镇化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民在职业选择、收入来源、生活方式等的异质性特征不断增强,农户生计策略呈现多样化特征。当前,对于农户生计策略类型的划分没有统一界定,一般可从家庭在不同生计活动中的投入或收入结构情况来了解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农户收入结构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反映更为直观。农户是所有家庭成员的集合,由于其成员可能从事不同类型的生计活动或生计策略,某一农户很可能具有多元化收入来源。总体来说,农户的收入来源包括农作物生产、畜牧业生产、资源直接开采利用、农场工资、务工工资、转移性支持、财产性收入等。根据这些收入来源占比,可以判断哪些生计活动对维持生计起重要作用,进而可判断该农户的生计策略。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19]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的划分,依据农业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重进行划分。划分标准方面,按照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标准(表 1),将农户生计策略划分为纯农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兼业型、非农型四种生计策略类型。

表 1 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划分标准

生计策略类型	农业收入占比区间 /%
纯农型	[90, 100]
农业兼业型	[50, 90)
兼营农业型	[10, 50)
非农型	[0, 10)

农户收入结构所反映出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与家庭生产经营活动关系密切。具体而言,纯农型农户农业收入占比超过 90%,家庭成员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比如作物种植、畜禽养殖活动等。非农型农户非农业收入占比超过 90%,家庭成员以参与非农生产活动为主,比如外出务工、个体零售业经营、开办工厂等。农业兼业型、兼营农业型两类农户同时从事农业、非农业两类生产活动,以两类活动差异化参与程度,即两类收入来源占比不同区分。

本文样本中,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数量分布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数量分布统计

农户生计策略类型	2016 年		2018 年	
	农户数量 / 户	比例 /%	农户数量 / 户	比例 /%
纯农型	71	1.06	34	0.51
农业兼业型	735	10.98	550	8.21
兼营农业型	2959	44.20	2604	38.88
非农型	2929	43.76	3509	52.40
总计	6694	100.00	6697	100.00

2. 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的测量

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反映了农户生计活动多样化与生活水平提高的过程^[6]。实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被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农村减贫、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可以通过社会关系和体制环境变动来实现^[32]。农地流转市场的结构性盘活为农户摆脱其对农业生产的依赖、增加就业选择、获得多样化收入机会创造了条件。农户生计策略的多样化可从家庭成员非农业兼业活动的参与程度体现出来^[33-34]。本文采用农户非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作为衡量农户生计多样化的指标。

3. 农户生计资本的量化

根据 DFID 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对农户生计资本内涵的界定,参考已有文献^[35-37]设计适用于本文的生计资本指标体系(表 3)。特别说明的是,由于 CFPS2016 数据、CFPS2018 数据中缺乏农户承包地面积的信息,本文将 CFPS2012 年数据库调查获知的农户承包地面积按家庭编号进行匹配合并。此外,由于 CFPS 的访问对象是包括成人和儿童在内的农户家庭成员,涉及以农户家庭

为单位的人力资本变量时(如家庭成员年龄、受教育年限等指标),由于家庭劳动工作主要由成年人完成,家庭成年人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可以代表该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因此,在处理农户家庭各人力资本初级指标时,按农户编码匹配家庭成员信息,按成年人口数进行了平均处理,以反映该农户平均人力生计资本存量水平。

为分析不同农户间各类生计资本存量的总体差异,本文采用极值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权重计算方面,采用主客观相结合的综合赋权法得到每类生计资本指标的权重。首先,根据指标结构设计网络问卷,邀请分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共5位关注中国农地制度与农民生计问题的学者,3位从事农地利用管理相关工作的政府部门人员,3位基层村干部填写问卷后得到平均专家打分结果,并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各生计资本初级指标的主观赋值。然后,采用熵值法求得客观权重值,并将两种方法计算所得权重值进行平均作为生计资本指标最终的权重结果。最后,由各生计资本指标数据Z标准化后的值与其相对应的权重加权,得到五类生计资本指数。各类指标选取及权重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农户生计资本量化指标体系及权重

生计资本类型	指标	描述及单位	样本数	均值	权重
N 自然资本	N_1 家庭承包地面积	单位: hm^2	12427	0.189	0.663
	N_2 家庭用水	井水、河流山泉水=1; 自来水、纯净水=0	13525	0.369	0.337
	H_1 家庭劳动力数	参加劳动工作的人口数	13525	2.544	0.406
H 人力资本	H_2 家庭成员年龄	受访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岁	13134	47.720	0.190
	H_3 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	受访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10944	6.106	0.193
	H_4 家庭成员健康状况	受访家庭成员平均健康状况(非常健康=5; 很健康=4; 比较健康=3; 一般=2; 不健康=1)	13133	2.912	0.211
	P_1 房屋当前市价	单位: 万元	13416	17.307	0.308
P 物质资本	P_2 耐用消费品价值	家里拥有的所有耐用消费品总价值/元	13298	23436.560	0.145
	P_3 农用机械价值	家里拥有的农用机械总价值/元	13488	2753.553	0.164
	P_4 其他房产市价	除了住房外其他房产市价/万元	13521	4.112	0.183
	P_5 个体经营资产	家庭从事个体经营所拥有的资产价值/万元	13468	0.661	0.200
	F_1 家庭定期存款总额	单位: 元	11310	11420.300	0.272
F 金融资本	F_2 是否持有金融产品	目前家庭是有持有金融产品(是=1, 否=0)	13521	0.010	0.152
	F_3 待偿银行贷款总额	除房贷外银行贷款总额/元	13486	9681.499	0.140
	F_4 别人欠自家的钱/尚未归还借款	个人或者组织尚未偿还自家的金额/元	13515	4269.155	0.124
	F_5 待偿房贷本息总额	单位: 元	13479	6680.190	0.110
	F_6 家庭成员税后养老金数额	家庭成员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数额/(元/月)	13460	2127.239	0.108
	F_7 政府补助金额	由政府发放给农户的各类补贴总额/(元/年)	13382	897.845	0.094
	S_1 交通通信设备费	单位: 元/年	13477	1043.393	0.325
S 社会资本	S_2 家里是否有人是党员	是=1, 否=0	13525	0.100	0.248
	S_3 家里是否有人是宗教信仰团体成员	是=1, 否=0	13525	0.030	0.149
	S_4 家里是否有人是工会成员	是=1, 否=0	13525	0.028	0.146
	S_5 家里是否有人是个体劳动者协会成员	是=1, 否=0	13525	0.041	0.132

注:CFPS在统计家庭金融资产收入时,只调查了受访家庭在年底持有的本金和市值,并未将金融资产收入计入当年家庭收入中。

(三) 实证策略

1. 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利用二元 Logit 回归模型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行为的影响。生计策略类型包括纯农型、农业兼业型、兼营农业型和非农型四类,分别以各类型生计策略的选择行为作为因变量,则估计农户 i 选择第 k 类生计策略的基准回归模型为:

$$\ln\left(\frac{R_k}{1-R_k}\right) = \alpha_{0,i} + \beta_1 T_{out,it} + \beta_2 T_{in,it} + \beta_3 N_{it} + \beta_4 H_{it} + \beta_5 P_{it} + \beta_6 F_{it} + \beta_7 S_{it} + \beta_1 G_{it} + \beta_9 Y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若农户选择第 k 类生计策略,则 $R_k = 1$, 否则 $R_k = 0$; $T_{out,it}$ 和 $T_{in,it}$ 为农地流转参与变量,若参与则赋值为 1,不参与赋值为 0; N, H, P, F, S 分别为标准化后的各类生计资本综合指数,用以控制农户各类生计资本特征; G 是指样本农户 i 所在省(区、市)第 t 年的 GDP 总量(t 为 2016 年或 2018 年),用于控制样本所在省(区、市)的社会经济水平差异; Y 为年份控制变量,若农户是 2018 年样本则赋值为 1,2016 年样本则赋值为 0; $\beta_1 \sim \beta_9$ 为各变量待估系数; α_0 为待估常数系数; ε 为误差项。

为进一步揭示农地流转行为是否会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由于选取的衡量因变量农户生计多样化(Diversity)指标,本文采用 OLS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其基准模型为:

$$D = \alpha_{0,i} + \beta_1 T_{out,it} + \beta_2 T_{in,it} + \beta_3 N_{it} + \beta_4 H_{it} + \beta_5 P_{it} + \beta_6 F_{it} + \beta_7 S_{it} + \beta_1 G_{it} + \beta_9 Y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中: D 指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水平(Diversity)。

2. 稳健性检验——倾向性得分匹配法

倾向性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是一种基于“反事实推断”模型的方法,现已普遍应用于评估某一外生行为或政策效果的研究中^[38]。本文采用 PSM 法,基于量化后的农户各类生计资本变量对参与农地流转样本(处理组)与未参与农地流转样本(对照组)进行匹配,最小化处理组和对照组间的差异;再依据倾向得分取值估计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与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的净效应,即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treated, ATT),以作为对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对平均处理效应的简化定义为:

$$ATT = E(Y_1|T=1) - E(Y_0|T=1) = E(Y_1 - Y_0|T=1) \quad (3)$$

式中: Y_1 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选择某类生计策略的可能性或生计策略多样化水平值; Y_0 为农户不参与农地流转选择某类生计策略的可能性或生计策略多样化水平值。ATT 可测算流转户在参与及不参与流转情况下选择某类生计策略的可能性或生计策略多样化水平值的平均差异。

需特别说明的是,由于式(1)和式(2)中若干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如农地流转变量与各生计资本变量之间),需在回归分析时避免自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后文进行模型估计前,测算了模型方差膨胀因子(VIF)。VIF 结果均小于判断标准 10,本文实证模型中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 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结果与分析

本文比较了不同生计策略农户农地流转的参与情况(表 4)。从统计结果看,参与农地流转

的农户占总体农户的 26.99%；按流转方向划分，参与农地转出的农户占比为 14.17%，参与农地转入的农户占比为 12.82%；从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分布看，非农型和兼营农业型农户最多，反映了样本农户总体生计非农化程度较高。

本文进一步比较了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农地流转的参与情况。从结果分析看，农地转出率在纯农型、农业兼业型、兼营农业型农户中的占比较为接近，农地转出率在非农型农户中的占比(20.97%)显著高于其他三类农户中的占比。农地转入率在农业兼业型农户中占比最高(23.97%)，在兼营农业型农户(18.46%)和纯农型农户(17.14%)中的占比接近，在非农型农户中的农地转入率仅为 5.65%。由上述统计性描述结果初步可知，转出农地的农户生计非农化程度更高，更有可能从事非农型生计策略。转入农地的农户从事非农型生计策略的概率很小，更可能从事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生活计策略。

表 4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中的农地流转参与情况

农户生计策略类型	全部户数 / 户	农地转出户数 / 户	农地转出户占比 / %	农地转入户数 / 户	农地转入户占比 / %
纯农型	105	10	9.52	18	17.14
农业兼业型	1285	86	6.69	308	23.97
兼营农业型	5563	451	8.11	1027	18.46
非农型	6438	1350	20.97	364	5.65
合计	13391	1897	14.17	1717	12.82

生计资本是农户实现生计策略的资源基础，本文进一步比较了不同生计策略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存量，结果如图 3 所示。总体而言，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各类生计资本指数特征差异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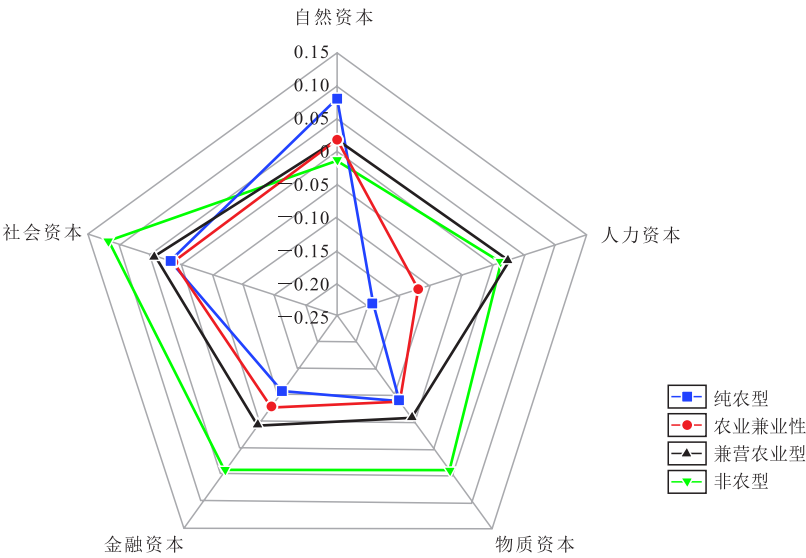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生计资本指数

(1)自然资本存量方面，纯农型农户最高，呈现出随农户非农兼业化程度增加而减少的趋势，非农型农户的自然资本存量最低。样本中农户间自然资本的差异主要体现为家庭承包地面积的

不同:纯农型农户人均承包地面积为 0.22 hm^2 ,而非农型农户则为 0.20 hm^2 。

(2)人力资本存量方面,纯农型农户最低,整体呈现人力资本指数随非农兼业化程度增加而增加的趋势。除农户劳动力人口数外,样本中农户在平均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程度三个指标的得分均随非农兼业程度的增加而增加。以受教育程度为例,纯农型农户家庭成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4.32 年,非农型农户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则可达 6.75 年。

(3)物质资本存量方面,非农型农户指数最高,呈现随非农兼业化程度增加而增加的趋势。包括房产、耐用品资产、经营性资产等在内的家庭固定性资产价值差异是引起样本中农户间物质资本存量差异的主要原因。以住房价值为例,非农型农户的平均住房价值为 23.47 万元,而纯农型农户平均住房价值仅为 13.41 万元。

(4)金融资本存量随非农兼业化程度增加而增加的趋势更明显,非农型农户金融资本指数最高,纯农型农户最低。样本中农户金融资本存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定期存款金额和退休金领取金额方面。非农型农户的平均定期存款金额为 16 806.61 元,高于兼营农业户(10 645.2 元)与农业兼业型户(5 586.623 元),纯农型农户的平均定期存款金额仅为 1 202.90 元。非农型农户家庭成员每年平均可领取养老金 3 492.48 元,显著高于兼营农业户(1 300.99 元)与农业兼业户(869.86 元),纯农型农户家庭成员每年平均仅可领取 410.19 元养老金。

(5)社会资本存量方面,非农型农户最高,两类兼业户次之,纯农型农户最低。一般来说,随着农户生计非农化程度提高,社会关系越丰富,社会资本越高。样本中农户间社会资本存量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会联络与社会身份方面。非农型农户每年平均交通通信费用为 4 387.97 元,显著高于兼业户(兼营农业户 3 429.20 元,农业兼业户 3 683.46 元)和纯农型农户(3 322.82 元)。社会身份方面,在兼营农业户和非农户中,有家庭成员为党员的比例分别达到 14.45% 和 13.94%,农业兼业户中有家庭成员为党员的比例为 11.94%,纯农户中这一比例仅为 8.54%。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1. 基准估计结果

采用 Logit 模型和 OLS 模型估计农地流转及生计资本变量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如表 5 所示。从农地流转变量的估计结果来看,农地转出变量对非农化生计策略的影响估计系数为 0.928,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户参与农地转出有利于促进农户选择非农向生计策略。此外,农地转出农户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有显著抑制作用。在本样本全部转出户中,选择非农向生计策略的农户占比为 71.17%,而选择进行农业兼业化生产的农户占比为 28.30%。生计非农化水平的估计结果也表明,农地转出变量对农户多样化生计策略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有利于促进农户收入多元化。

农户转入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估计结果显示,农地流入可以显著提高其选择农业兼业、兼营农业、纯农型生计的概率,对其选择非农型生计有显著负向效应。在本样本全部转入户中,77.75% 的农户选择了兼业化生计策略。从回归系数绝对值来看,农地转入对农户选择农业兼业型生计(农业生计为主)的影响要大于农户选择兼营农业型生计(非农业生计为主)的影响。生计非农化水平中农地转入变量对生计多样化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与 Zhang 等^[21]的研究结论类似,转入农地会促进农户的农业生产职业化,对农户实现多样化生计转型产生负向效应。

表 5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及生计多样化水平影响的回归估计结果

变量名	纯农型	农业兼业型	兼营农业型	非农型	生计非农化水平
农地转出	- 0.439(0.757)	- 0.871*** (0.218)	- 0.698*** (0.0974)	0.928*** (0.0971)	0.0799*** (0.00688)
农地转入	0.707* (0.420)	1.068*** (0.113)	0.687*** (0.0846)	- 1.397*** (0.101)	- 0.136*** (0.00808)
自然资本	0.0720 (1.024)	0.538** (0.271)	- 0.104 (0.164)	- 0.0846 (0.169)	- 0.0286* (0.0151)
人力资本	- 0.835 (3.068)	- 2.609*** (0.645)	1.427*** (0.396)	0.441*** (0.408)	0.0572* (0.0343)
物质资本	1.428 (2.445)	- 0.581 (0.703)	- 2.690*** (0.383)	2.683*** (0.393)	0.109*** (0.0305)
金融资本	- 10.58*** (2.287)	- 2.856*** (0.934)	0.181*** (0.444)	0.715*** (0.466)	0.122*** (0.0341)
社会资本	- 5.345*** (1.793)	- 1.002** (0.460)	- 0.547*** (0.273)	1.016*** (0.279)	0.123*** (0.0228)
所在省(区、市)GDP	- 1.179 (0.793)	- 0.996*** (0.290)	- 1.346*** (0.143)	1.691*** (0.142)	0.121*** (0.0110)
年份	- 1.614*** (0.593)	- 0.436*** (0.113)	- 0.256*** (0.0621)	0.452*** (0.0637)	0.0510*** (0.00544)
常数项	- 3.500*** (0.784)	- 1.377*** (0.177)	0.152 (0.109)	- 0.967*** (0.113)	0.728*** (0.0101)
Wald chi2/F 值	127.43***	213.12***	334.12***	565.34***	108.94***
观测样本数	4914	4914	4914	4914	4914

注:表中“()”内为标准误差;“*”“**”“***”分别代表系数通过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从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异质性特征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来看,自然资本对农户生计非农化水平有显著负向效应。可能的原因在于,以承包地规模为代表的自然资本能够为农户实现农业集约化生计策略创造条件,因而农户更少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进而降低了农户从事多样化生计的可能。

人力、物质、金融、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关键资本变量,四类生计资本的提升会显著减低农户选择兼业化生计策略的概率,同时会促进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从四类资本变量估计系数的绝对值来看,随着农户非农兼业化程度的提升,四类资本变量提升对农户选择农业兼业型、兼营农业型生计策略的负向作用会逐渐减弱。现对得到上述估计结果的可能原因进行分析如下。

农户人力资本水平是家庭劳动力数量、平均年龄、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的综合体现。家庭劳动力数量有利于非农就业供给,劳动力剩余是促进农户参与非农就业的主要动力;劳动力越年轻化,农户越可能获得更多非农收入,因为年轻人更愿意从事非农就业活动^[39];农户成员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可能提高农户的非农就业能力;健康对劳动者而言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良好的健康状况对实现农户劳动力剩余,提高非农就业能力有重要作用。物质资本主要由农户非流动性固定资产组成,一般来说,农户物质资本越高,其应对风险的能力和生计选择能力越强。物质资本高的农户更有意愿参与城镇化中去,他们更有可能在农场外从事报酬更高的工作。金融资本主要体现了农户信贷能力与金融投资水平。农户金融资本越高,越有可能利用金融服务和信贷资金获得直接投资回报收入,获得更多生产资金从事多样化生产劳动。此外,此文初步证实了社会资本在农村熟人社会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更宽广的社会网络有利于促进农户选择非农化、多样化生计。以上结果表明,人力、物质、金融、社会资本的提升均有利于促进农户从事非农向生计策略、实现生计策略多样化。

2.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选择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本文基于式(5),依据 PSM 法原理,运用卡尺匹配法,按一对一对样本进行匹配,并将 Logit

模型所估计的各生计策略选择预测概率作为倾向性得分,对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作用进行稳健性检验。经过倾向性得分匹配后所估计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如表 6、表 7 所示。

表 6 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生计策略类型	处理效应	处理组	控制组	差距	标准误差	<i>T</i> 检验值	满足共同支撑的样本量
纯农型	Unmatched	0.003	0.006	− 0.003	0.003	− 0.86	4896
	ATT	0.003	0.008	− 0.005	0.005	− 0.99	
农业兼业型	Unmatched	0.039	0.098	− 0.059	0.012	− 4.77	4896
	ATT	0.039	0.117	− 0.078	0.017	− 4.72***	
兼营农业型	Unmatched	0.276	0.457	− 0.181	0.021	− 8.56	4896
	ATT	0.276	0.430	− 0.154	0.029	− 5.34***	
非农型	Unmatched	0.682	0.439	0.243	0.021	11.45	4896
	ATT	0.682	0.445	0.237	0.029	8.08***	

表 7 农地转入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生计策略类型	处理效应	处理组	控制组	差距	标准误差	<i>T</i> 检验值	满足共同支撑的样本量
纯农型	Unmatched	0.012	0.005	0.007	0.003	2.36	4905
	ATT	0.012	0.006	0.005	0.005	0.99	
农业兼业型	Unmatched	0.195	0.071	0.124	0.011	11.22	4905
	ATT	0.195	0.063	0.132	0.017	7.62***	
兼营农业型	Unmatched	0.588	0.406	0.182	0.019	9.49	4905
	ATT	0.588	0.405	0.183	0.027	6.88***	
非农型	Unmatched	0.206	0.519	− 0.313	0.019	− 16.5	4905
	ATT	0.206	0.526	− 0.320	0.025	− 12.87***	

从估计结果看,农地转出对农业兼业型、兼营农业型、非农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 ATT 估计结果分别为 − 0.078、− 0.154、0.237,且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同样验证了农地转出对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显著促进作用。农地转入对农业兼业型、兼营农业型、非农型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 ATT 估计值分别为 0.132、0.183、− 0.320,均在 1% 水平上显著,结果与 Logit 模型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同样采用 PSM 法估计了农地转入及农地转出对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的平均处理效应(表 8)。由表 8 可知,农地转出、农户转入变量对因变量的 ATT 估计值分别为 0.099、− 0.152,均在 1% 水平上显著,结果与表 5 中农地流转变量对因变量的主效应估计结果一致。

表 8 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处理变量	处理效应	处理组	控制组	差距	标准误差	<i>T</i> 检验值	满足共同支撑的样本数
农地转出	Unmatched	0.897	0.801	0.096	0.009	11.16	4896
	ATT	0.897	0.798	0.099	0.012	8.46***	
农地转入	Unmatched	0.686	0.837	− 0.151	0.008	− 19.83	4905
	ATT	0.686	0.838	− 0.152	0.011	− 13.74***	

PSM 法估计结果在满足共同支撑假设和平行假设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在估计平均处理效应前,需对样本匹配后的共同支撑区域进行平衡性检验。从结果看,绝大多数观测值在共同支撑范围内,样本损失率少,有足够的共同支撑样本量完成有效模型估计。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后控制变量的标准化偏差都显著减小,绝对值均小于 10%,且 T 检验值结果均表明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协变量间不存在系统性差异。表 9、表 10 为生计策略选择模型匹配总体拟合优度统计结果,显示匹配前后偏差均值显著降低,Pseudo-R² 值均降低,LR 统计量均不再显著,表明匹配结果可以较好平衡两组样本的协变量分布,平行假设检验可以得到验证。

表 9 样本匹配平衡性检验模型拟合优度统计结果（基于 Logit 模型）

处理变量	样本	Pseudo-R ²	LR 统计量	p 值	偏差均值
农地转出	匹配前	0.012	44.51	0	11.4
	匹配后	0.001	1.36	0.929	2.4
农地转入	匹配前	0.003	11.26	0.046	4.6
	匹配后	0.003	7.35	0.196	5.1

表 10 样本匹配平衡性检验模型拟合优度统计结果（基于 OLS 模型）

处理变量	样本	Pseudo-R ²	LR 统计量	p 值	偏差均值
农地转出	匹配前	0.012	44.51	0	11.4
	匹配后	0.002	3.51	0.622	4.5
农地转入	匹配前	0.003	11.26	0.046	4.6
	匹配后	0.002	3.72	0.591	3.8

四 结论与启示

农地是农户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地流转为农户实现生计策略转型提供了机会。然而,已有研究关于农地流转是否会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型带来积极影响尚未得到一致性结论,缺乏全国农户微观尺度的经验证据,且已有研究关于农地流转参与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机理性阐释不足。本文基于 DFID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理论框架,利用全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 Logit/OLS 回归和 PSM 方法实证检验了农地流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生计非农化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能够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转出农地可以促进农户从事非农向的生计策略,加快农户职业多样化进程,转入农地能促进农户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从事农业向生计策略。不同类型生计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和多样化水平有差异化影响:家庭自然资本提升会对农户实现非农多样化生计有负向影响;人力、物质、金融、社会资本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农户从事非农向生计策略、实现生计策略选择多样化。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到的启示如下。第一,农地流转可以为农户提供生计多样化选择的机会,转出农地有益于提升农户生计非农化水平,转入农地能够为农户实现农业生产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基于此全国性平均经验,因地制宜地发展功能完善的农地流转市场仍是现阶段农地流转政策的主要方向。第二,生计资本异质性是影响农户生计策略多样选择的关键因素,提升人力、物质、金融、社会资本存量有益于增强农户生计非农化水平。四类生计资本中,农户人力、金融、社会资本可通过政策手段针对性提升。人力资本方面,可通过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公

共服务卫生投入等提升农民劳动力素质和健康水平。金融资本方面,可以通过提升农民对金融市场的理性认知、协同建立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等方式,提升农民参与金融市场的能力。社会资本方面,应注重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建设,提高农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能力。

参考文献:

- [1] 刘守英,熊雪锋.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制度供给[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9:80-96.
- [2] 崔红志.乡村振兴与精准脱贫的进展、问题与实施路径——“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脱贫研讨会暨第十四届全国社科农经协作网络大会”会议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18(9):136-144.
- [3] 钱忠好,牟燕.乡村振兴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J].农业经济问题,2020(4):28-36.
- [4] Jin S, Deininger K. Land rental market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Productivity and equity impacts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9, 37: 629-646.
- [5] 肖卫东,梁春梅.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内涵、基本要义及权利关系[J].中国农村经济,2016(11):17-29.
- [6] Ellis F. 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rur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 35: 1-38.
- [7] 陈丹,任远,戴严科.农地流转对农村劳动力乡城迁移意愿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17(7):56-71.
- [8] Yan X, Bauer S, Huo X, Farm size, land reallocation, and labour migration in rural China[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4, 20: 303-315.
- [9] 杨子砚,文峰.从务工到创业——农地流转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形式升级[J].管理世界,2020,36:171-185.
- [10] 胡新艳,洪炜杰.劳动力转移与农地流转:孰因孰果?[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37-145,169.
- [11] 张建,杨子,诸培新,等.农地流转与农户生计策略联合决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21-31.
- [12] 冒佩华,徐骥,贺小丹,等.农地经营权流转与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理论与实证[J].经济研究,2015,50:161-176.
- [13] 钱龙,洪名勇.非农就业、土地流转与农业生产效率变化——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6(12):2-16.
- [14] Hazell P, Poulton C, Wiggins S, et al. The future of Small Farms: Trajectories and Policy Priorities[J].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10): 1349-1361.
- [15] Bardhan P K. Size, Productivity, and Returns to Scale: An Analysis of Farm-Level Data in Indian Agriculture[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3, 81: 1370-1386.
- [16] Barrett C B. On price risk and the inverse farm size-productivity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6, 51: 193-215.
- [17] Qiu T, He Q, Choy S B, et al. The impact of land renting-in on farm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maize production in China[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20, 13(1): 22-39.
- [18] 蔡洁,马红玉,夏显力.集中连片特困区农地转出户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六盘山的微观实证分析[J].资源科学,2017,39:2083-2093.
- [19] 赵文娟,杨世龙,王潇.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以云南新平县干热河谷傣族地区为例[J].资源科学,2016,38:136-143.
- [20] 朱建军,胡继连,安康,等.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J].农业经济问题,2016,37:49-58,111.

- [21] Zhang J, Mishra A K, Zhu P. Identifying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transitions in rural China: Is land holding an obstacle? [J]. *Land Use Policy*, 2019, 80: 107-117.
- [22] 刘颖, 南志标. 农地流转对农地与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甘肃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9, 34: 957-974.
- [23] Pandey R, Jha S K, Alatalo J M, et 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based indicators for assessing climate change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for Himalayan communities [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7, 79: 338-346.
- [24] 何仁伟, 李光勤, 刘运伟, 等. 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 182-192.
- [25] Kaewkallaya N, Shrestha R P, Tibkaew A P. Effect of agricultural land reform development project on rural livelihood: experience from Thailan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2014, 5: 20-25.
- [26] 丁士军, 张银银, 马志雄. 被征地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改进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 25-34, 110-111.
- [27]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R]. London: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9.
- [28] Scoones I.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M]. Brighton: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8.
- [29] Han W, Zhang Z, Zhang X. The impact of farmland transfer participation on farmers' livelihood choices –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2014 Three Property Rights Separation reform [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23, 15(3): 534-562.
- [30] 吴雄周, 金惠双. 生计资本视角下农户生计策略变动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FPS 四期追踪数据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1, 42, 941-952.
- [31] 周云波, 杨家奇. 农户生计恢复力与家庭教育期望——基于 CFPS 数据的实证分析 [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23, 45, 16-30.
- [32] Ellis F. The determinants of rural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0, 51, 289-302.
- [33] 马志雄, 张银银, 丁士军. 失地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研究 [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15, 54-62.
- [34] Martin S M, Lorenzen K.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 in rural Laos [J]. *World Development*, 2016, 83, 231-243.
- [35] 全磊, 陈玉萍. 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127-135, 161.
- [36] 赵立娟, 王苗苗, 史俊宏. 农地转出视阈下农户生计资本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 CFPS 数据的微观实证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9, 40, 612-620.
- [37] 袁东波, 陈美球, 廖彩荣, 等. 土地转出农户的生计资本分化及其生计策略变化 [J]. *水土保持研究*, 2019, 26, 349-354, 362.
- [38] Caliendo M, Kopeinig S. Som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008, 22, 31-72.
- [39] Ji Y, Yu X, Zhong F. Machinery investment decision and off-farm employment in rural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2, 23, 71-80.